

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丁钢 主编

文化、性别与教育： 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

张素玲 著



Culture, Gender and Educatio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1900s-1930s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张素玲 著

文化、性别与教育：

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徐 虹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 /
张素玲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2
(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 / 丁钢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3990 - 0

I. 文… II. 张… III. 女子大学—教育史—中国—1900 ~
1930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8141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4.75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213 千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总序

丁 钢

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教育都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教育，并且期望发展教育，就必须了解和理解这种生活方式。当然，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当其以经验事实的方式流动的时候，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图景。而要揭示这幅丰富多彩的教育图景，教育叙事研究就会成为重要的理论方式。

在教育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想与语言的错位：二者的发展总是不协调。一方面不断有新的想法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却由于理论语言传统的限制而很难加以表达。而今教育叙事研究的流行，并非出于追求新颖，而是深切地感到出于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人群、事件与感受只能借助于叙事语言才能表达清楚，在事实描述阶段就对语言进行刻意的理论化加工，必然会扭曲日常生活事实的本来面貌。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知识往往是以“权力”的形式发生作用，人们很难进入那些描述、界定他们的理论话语体系，他们只能承受理论话语的界定。从这一意义上讲，叙事语言还承担着这样一种使命：使普通读者能够参与进来，并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叙事文本进行评价。叙事文本所揭示的事实性内涵也就会随之扩大，因为某一次叙事并不能达到对事实的充分表达，但是读者的进入，并与文本中叙述的事实

进行对话，却可以使文本逐渐接近事实，而要保证读者可以对话，就需要使用读者习惯的生活语言。

就目前的主流学术研究而言，显然仍是理论语言一统天下。即便描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理论语言的表述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让我们重温加登纳的话吧：“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纷繁复杂的情形，也间接地反映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的本质中。从实践的观点看，语言的主要用途包含了交流信息，表达要求，给出指示，提出建议等等。它的作用就是要通过下列途径，使行动变得容易，即把世界的各种特征都加以分类，以使它们得到辨认，并把它们与我们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且，因为生活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如果我们要使生活具有意义并达到我们的目的，就需要不断地简化我们的生活，同时不断地重新适应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的语言就必须是可选择的，可变动的，可调整的。”（加登纳. 历史解释的性质 [M]. 江怡，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6-7）

当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而需要解决的无数多变的问题时，会根据常识行事，而根据常识行事，就意味着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在这里，“常识”则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的诀窍和权宜之计，它们是松散而缺乏严格性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日常生活语言的这种本性而可以像哲学家般地对日常生活的语言加以精确化和严格化，结果反而不能适合其作用，并导致理解的困境。“常识”不同于“专门知识”，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理解，却可能产生于“常识”和“专门知识”的对比语境之中。这构成了一种语言的张力，尤其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当我们关注日常教育实践的活动时，就可能产生自身的话语方式。而这正是我们关注教育叙事的目的。

我们愿意把这种探究看作是一种教育研究的实验行动。当然，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教育叙事的方法实验，更在意对于教育研究本身乃至教育学科发展的实验尝试。也不单纯是对于教育叙事的行文风格和话语的兴趣，更多的是，我们实在难以抗拒蕴藏其中、并对教育学本身意味深长的发展取向和趋向的诱惑。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我以为，教育叙事的研究兴起，已经超越了对于西方叙事方法的借鉴，或者本土化的含义，而在实践中满怀着对于教育学自身理论建构的深情厚

谊。所谓：“言于此，意在彼”，确是这种心情和意愿的真实写照。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由五部著作构成。

丁钢所著的《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力图为教育叙事研究建立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迄今为止，有关教育叙事研究的论述很多，但是系统阐述教育叙事研究的专著缺场，使得许多问题显得模糊不清。在此书中，通过对西方叙事理论和方法的梳理反思，尤其是对教育叙事理论资源的辩证分析，提出把教育叙事的理论建立在教育叙事与日常教育实践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廓清其方法论及其意义。并指出了作为理论探究的教育叙事研究的五个方面的理论范畴，从而为教育叙事探究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而另外四本著作，则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教育叙事的研究。

许美德所著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教育的国际知名专家，她的这项研究历经数年，访谈了当代中国知名教育家如刘佛年、李秉德、朱九思、王承绪、潘懋元、汪永诠、顾明远、谢希德、鲁洁、叶澜等，从叙事研究的角度对他们从童年至一生的教育、生活、学术和领导的经历作出了深入的研究。结合他们个人的发展中国大学及其教育发展的历程，以个体和群体相结合的经历勾画出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复杂多变和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精彩诠释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及其教育发展中，通过这些知名教育家所呈现的中国教育发展取向和独特命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张素玲所著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揭示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所伴随的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使女子教育被纳入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主流话语中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此书指出女性并不只是被定义和想象的性别群体，在对女大学生家庭、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的研究中显示，女性并没有完全服膺精英知识分子关于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的倡导。女子教育目标、知识分子热切的对于女性的期望，与女大学生自己对于独立生活和职业的追求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来自不同环境中的女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她们的故事也显示了，教育对于她们内在的精神品质的影响使她们有着同样的对独

立、平等的追求和坚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孙崇文所著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认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物，大学生包括基督教大学的学生的生活史研究无疑也是一把帮助我们解读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钥匙。作者结合学生不同的求学经历及其个人成长作具体的考察，关注学生个体的早年经历及其入学的目的，尤其关注不同个体在家世、地域、性别和年代等方面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学生们在基督教学大学求学期间的生活场景，如基督教学大学学生们的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等。指出基督教学大学在华发展的数十年间，学生们是如何处于这种极端对立与冲突的矛盾漩涡的中心，他们的内心深处所承受着这些极端对立与冲突的评价标准的拷问，“我是谁？”、“我究竟应该成为谁？”以及在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之间，用他们自己的言行所做出的抉择。

王树等著的《教师印迹：课堂生活中的叙事》，这是该书作者们对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生活进行长期现场观察和进行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从课堂观察入手，对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教学进行研究，通过故事描述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使人们熟悉又陌生的课堂生活得以展现，从而揭示了那些看似平常，甚至教师本人习焉不察的行为背后隐含的教育内涵，在课堂实践中寻找教师确认的意义链接，并解释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的意义。

这是我国第一套以教育叙事研究中国教育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图文并茂的著作系列。此系列书稿选题独特新颖、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沿，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对教育研究的导向性。此系列出版同样也是基于主编者在近年来以教育叙事研究推进教育经验的理论研究，以及指导这种新颖研究方式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我们真诚地期望能够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并由此提升中国自身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而尽上一份微薄之力。

目 录

绪 言 // 1

第 1 章 寻求现代性：新女性的出现 // 23

从边缘到中心：康爱德的故事 // 24

精英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性与女性问题的论述 // 30

新女性 // 44

女大学生生活的特殊性 // 52

小 结 // 65

第 2 章 在宁静疏离的学院 // 66

异国的土地上：传教士教师的性别观念与身份认同 // 71

学校教育：内容、目标、结果 // 88

女学生与宗教教育 // 92

采用不同的方式：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女学生 // 97

合校与女性对新的性别角色的认识 // 111

何处是归程：职业与婚姻的矛盾 // 120

小 结 // 125

第3章 风潮激荡中的女高师与女学生 // 127

- 从母亲到国民教师：一所国立女子大学的起源 // 127
- 变迁与历史记忆 // 131
- 课程与教育目的 // 144
- 激进思想及其后继者 // 147
- 反抗与困境 // 154
- 小 结 // 169

第4章 进入男性世界 // 171

- 开女禁 // 172
- 一个文化视角的比较 // 179
- 新的校园生活 // 181
- 对于新女性的争论 // 187
- 进入男性领域 // 198
- 小 结 // 207

结 语 在促进与阻滞中发展 // 209

参考文献 // 212

后 记 // 223

CONTENT

Preface // 1

Chapter 1 Seeking Modernity: New Women Arose // 23

From Edge to Core: The Story of Ida Kahn // 24

Elite Intellectual's Exposition on Chinese Modernity and Women // 30

New Women // 44

The Particularit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 52

Conclusion // 65

Chapter 2 In Peaceful, Alienated College // 66

In Alien Country: The Gender Viewpoint and Identity of Missionary Teacher // 71

School Education: Content, Aims and Result // 88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 92

Different Way: Female Students in Nationalist Movement // 97

Merging Men School and Women School and the Women's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Gender // 111

Where is My Home: The Conflict between Career and Marriage // 120

Conclusion // 125

Chapter 3	Beijing Female High Normal Colleg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Turbulent Current // 127
	From Mother to Teacher of Citizens: The Origin of a Female College
	Set up by Government // 127
	Changes and Memory of History // 131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al Aims // 144
	Radical Thought and Successor // 147
	Revolt and Predicament // 154
	Conclusion // 169
Chapter 4	Entering into the Male World // 171
	Begin to Receiv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 172
	The Analysis from Culture Viewpoint // 179
	New School Life // 181
	Discussion on New Women // 187
	Entering Male's World // 198
	Conclusion // 207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e and Resistance // 209
References	// 212
Postscript	// 223

绪 言

1885 年 5 月，金雅妹（1864—1934）在美国纽约医院所设的女子医科大学完成了她的学业，这位来自浙江宁波的女孩，成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学生。（高时良，1992：897—902；Burton, 1919）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这一时期的士子们却依旧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来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维新知识分子康有为和他未来的弟子梁启超，还正在踌躇满志地潜心学问，以图参加应试，民族危机与个人的挫折还未彻底摧毁这些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信念。^①尽管这时在中国的教育图景中已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新式学堂，但是，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从教育体制上，这些学校都仍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应该说，现代大学还未在中国社会出现。^②大部分女性和她的世代的姐妹一样仍被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更遑论接受高等教育。

也是在这一时期，在遥远的中国南方，福州毓英女子寄宿学校的教师伊丽莎白·菲希尔小姐已经开始梦想为中国女子创办一所大学。一次，在被邀请于福州“妇女之夜”年会上讲话时，面对已经感到疲倦的听众，她大声说：“时间已经太晚了，我准备好的讲话已无法进行了。你们当中甚至有人已经睡着了。所

^① 关于康、梁在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可参见：胡成. 困窘的年代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120—124.

^② 加拿大学者许美德的研究认为，自 1860 年以后，清政府相继开办了一些新式官立学校，传授外语、现代科学知识以及洋务运动中所需要的实用技术，但是，它只是当时科举制度的一种辅助形式，并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且，就学术水平而言，这些学堂还只是一种高水平的训练学校，并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此外，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由各省官僚、士绅创办的私立新式学堂以及一些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但是，这些学校只能说是现代大学的雏形，很少有能达到大学的办学标准的。参见：许美德. 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4—56.

以我要投下炸弹！人们给我们女孩子多少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孩子中等教育，那一定也要给女孩子中等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孩子大学教育，那也一定要给女孩子大学教育……”（华惠德，1990：59）然而，在中国社会真正觉醒之前，伊丽莎白·菲希尔小姐的声音依旧是微弱的。

不过，动荡的中国社会以及谋求强国的努力，已经使变化的种子悄然播下。

就在金雅妹走出大学十年以后，又有三位中国女子分别毕业于美国大学，19世纪末期，她们相继返回家乡并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活。^①与金雅妹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她们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与广泛关注。1895年中日战争带来的挫折已经不只使人震惊，也令人们开始寻求变革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女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898年，在维新知识分子以及进步士绅的努力下，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女子学堂在上海诞生；1905年，也就是在科举制度彻底废除之时，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开始招收女生；1919年，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继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女性走进了男性的学习领域，男女合校开始。1922年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全国大学女生数为887人。（俞庆棠，1981：364）10年以后，接受大学教育的女生人数已达到5210。（程谪凡，1936：180）

本书正是以这些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和揭示她们在不同教育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境遇，她们所获得的性别角色和身份认同的社会文化意义，探讨和理解20世纪初期，在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变迁中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20世纪初期，当人们重新审视和思考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之时，由于女子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性别观念的变化而带来的女性社会就业机会的增长，促使一些女性开始追求高等教育。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离开家庭到异乡和陌生的地

^① 这三位女子分别是康爱德（1897—1931）、石美玉（1872—1954）、何金英（1865—1929）。关于她们的故事可参见：BURTON, M E. 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 [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方，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她们母亲们的大学生活。作为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和同时代的男学生相比，她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和认识，和她们的前辈以及稍早一些的激进女性相比，她们所经历和体验的也许更加复杂。她们所面临的不仅是新的、她们的母亲们从未思考和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而且也是早期激进女性们（比如秋瑾）无暇或无须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家庭、婚姻与职业，都是令她们困惑也是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总之，无法否认的是，性别是形成女大学生经验的一个独特要素。

这些女大学生的故事使我们开始思考一些在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尚未得到深入探究的问题。20世纪初年，中国绝大多数的女性还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作为少数精英知识女性，这些女大学生的经历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在追求女子高等教育上，她们是先驱，从她们中间产生了中国第一代现代职业女性。她们的生活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紧密相关。然而，长期以来，她们的经历却很少有人提及，解放以后由全国妇联选编的关于妇女解放的书大都集中在妇女运动方面。而且，即便是在当时，这些女学生也鲜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许美德在她关于中国大学的专著中曾谈到，国际联盟1931年关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报告上只写到，1931年女性在大学里的比例是10%，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提到其他有关女大学生的情况。在许美德看来，大学里的女生和性别不平衡问题也许根本没有引起官员们的注意。（许美德，2000：80）

在学术研究领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从性别视角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校、学生的著作依然很少见到。一些研究20世纪初期大学状况的著作也很少关注女性，即便提到，也往往用“年轻人”、“female man”等词汇指代，这些词的频繁使用表明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性别问题，没有意识到在许多问题上女性也许有着不同于男性的认识、体验以及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学者叶文心的研究。在她的一本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研究著作中，就极少提到女学生的情况。书中有一章是通过介绍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来反映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和情感状况，但是，女性的作品却一篇也没有收录，而且书中所引用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全部是男性。书中还分析了大学校园里学生的服饰，她认为长袍、制服、西服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选择、阶级与政治立

场，在不同的大学里流行不同的服饰，而每一种服饰则意味着不同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倾向。显然，女学生在这里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周策纵, 2001; Yeh, 1990)

另外，女大学生不仅是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以及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社会性别角色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中，女学生开始了她们不同于以往的生活与思考。因此，对于女大学生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从另一个侧面探讨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认识性别、现代性与女子教育之间复杂关系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教育史也许能有更丰富、多角度的理解。

其实，从晚清到 20 世纪初期，性别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中国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常常运用性别来比喻中西方的关系，或者把妇女问题作为新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性别观念也因此成为文明进化的象征与历史书写的隐喻^①。例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②在他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序中曾写道：

本书则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为比较教化优劣之定格，此即之名所由取，亦即可称为万国古今教化之论衡，又即可使读是书者，得以自证中国教化所至之真地位也……全书之宗旨，可用两言以蔽之：一曰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一曰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使成其材，决不能有振兴之盼望。(李又宁，张玉法，1975: 824)

① 关于性别与民族国家以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近来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如：贺萧.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DURAR P.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8, 37: 4; BARLOW T. Theorizing women: funu, guojia, jiating [G] //ZITO A, BARLOW T.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MENG Y. Female images and math [G] //BARLOW T.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WANG Z.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② 林乐知，本名 Young J. Allen (1836—1907)，毕业于佐治亚州埃温里大学，1860 年被派来中国传教，1868 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为 19 世纪介绍西学最集中的期刊，也是最早倡导废缠足、兴女学的刊物。

林乐知素来以“振兴华人，启迪女学”为己任，他的所谓万国古今教化之论衡就是把世界之人分成三等：未教化人（非洲人）、有教化人（东西亚人）、文明教化人（欧美人）。无疑，林乐知的语言带有浓重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一观点却在当时及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与认同。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成了他们广为论述的话题，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与反思中，他们认为，中国社会谋求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就是要使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从肢体和精神上解放出来。这时，延续了千年的缠足风俗开始被认为是野蛮和原始的，它不仅戕害了妇女的身体，而且由于缠足而导致的妇女孱弱的身体，还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下一代。在他们看来，国家积贫积弱，妇女的缠足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只有学习西方妇女解放肢体，才能使母健儿肥，中国的人种才能渐进，也才能与外国列强进行竞争。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开始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伴随的是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从这一时期开始，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在每一个女性的个体体验中。民族生存史上的巨大变迁使女性开始走入了历史的时间之流，并在时代的裹挟之下与时俱进。

然而，女性不只是一个被定义的性别角色。随着生活领域的扩大，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进而开始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尽管自晚清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的形象几经嬗变，然而国家和政府一直提倡贤妻良母是女子理想的社会角色，但一些女性尤其是接受了教育的新女性并未完全服膺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而是尽力争取自己工作、发展的机



林乐知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

会和权利，为此甚至不惜选择拒绝婚姻的人生道路。^①可以说，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改变了妇女的命运，同时，妇女又在积极重塑着自己的角色。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使女子学校教育进入了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最终纳入国家主流话语而迅速发展起来。女子教育的发展是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和救亡保种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创建联系在一起的。就某种意义而言，正是这种救亡保种的话语成为把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范围带往公共领域的载体，使女子接受教育这一观念能够冲破传统的桎梏而迅速被人们认同。应该说，早期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外力”推动的结果，是在男性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倡导下起步的。教育的目的并非基于女性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是女性作为生理性别的职能（即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能），它不是把女性作为一个主体，而是作为一个载体来看待的。在精英知识分子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中，女性只是一个“他者”。

然而，当女性进入学校接受了教育，她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于是，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为女人所设计的人生道路与女性的主体愿望之间也逐渐出现了矛盾，并且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矛盾也会愈加尖锐和突出。教育目的、社会对女性的期待、社会给予女性提供的教育就业机会以及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的存在无不影响着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当然，女性并非被动地接受这种影响，尤其是当女性自身作为教育者从事女子教育实践活动时，她的主动性会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从而显示出与既有教育的差异。但是，如同一切事物一样，女子教育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时代，女性也只有在可能的空间内才能求得发展，这就使女子教育呈现出有别于男性的复杂性。近代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展的。

^① 关于这一问题，学者游鉴明有深入的研究。参见：游鉴明. 千山我独行：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有关女性独身的言论 [J].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2001 (9): 121 - 187.